




ICEFDDUN


伊格尔顿

W E N Y I L I L U N Y A N J I U

文艺理论研究

王 伟◎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伊格尔顿
文艺理论研究

王逢振 译

上海三联书店




IGEERDUN

伊格尔顿

WENYI LILUN YANJIU

文艺理论研究

王 伟◎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格尔顿文艺理论研究 / 王伟著. — 芜湖:安徽
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676-3480-0

I. ①伊… II. ①王… III. ①伊格尔顿-文艺理论-
研究 IV.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4430号

伊格尔顿文艺理论研究 王伟著

责任编辑:胡志恒

装帧设计:丁奕奕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网 址: <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 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1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76-3480-0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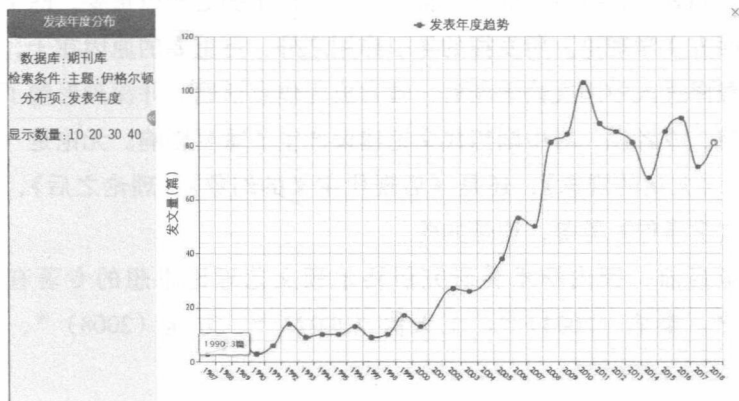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文学主张	5
一、半途而废的“反本质主义”	6
二、伊格尔顿:为“本质主义”喝彩	14
三、何谓作为“事件”的文学	28
第二章 批评观念	43
一、话语实践与政治批评	44
二、美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对话	54
三、论伊格尔顿的革命批评	62
第三章 文化研究	75
一、身体、美学与政治——论伊格尔顿的身体观	76
二、伊格尔顿的“文化主义”批评论述	89
三、分歧的取向——“后理论”景观扫描	104
第四章 悲剧理论	115
一、论伊格尔顿的悲剧观念及其悲剧的政治	116
二、邪恶美学与邪恶伦理	135
三、论伊格尔顿对神义论的批判	143

第五章 政治之爱	155
一、实践的幸福与政治之爱——读伊格尔顿《人生的意义》	156
二、繁论简说皆相宜——读伊格尔顿《文学阅读指南》	165
三、伊格尔顿视野中的福柯权力观辨析	172
参考文献	185

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被引入国内文艺理论界^①，到1980年第一部专著《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译介^②，再到1984年来华演讲与座谈^③、80年代中后期同一本著作（*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多个中译本的出版^④，伊格尔顿不仅迅速为中国文论界熟悉，还成了研习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重要领路人。90年代之后，对伊格尔顿的研究逐渐增多。21世纪以来，这种增长的势头更趋猛烈。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知网的“发表年度趋势”与“学位年度趋势”上看得十分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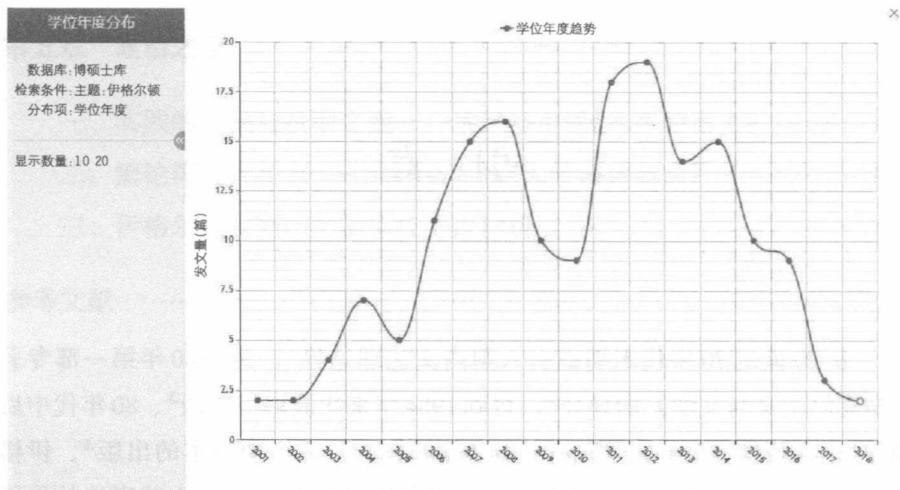
图一

① 参看[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外国文学动态》1978年第7期；[英]特里·伊格尔顿：《作家与倾向》，文宝译《外国文艺》1979年第2期。

② [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③ 冯真：《文学理论家伊格尔顿来华讲学》，《世界文学》1985年第1期。

④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英]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图二

不妨说,伊格尔顿已成为文论研究中非常显赫的部分。直至今今,伊格尔顿的文艺思想仍然是研究的热点之一。作为当代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之所以重要,除了其《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所发挥的导引作用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著作通过翻译进入中国文论现场后,常常成为焦点话题,并深刻形塑了中国文论的样貌,或者说,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审美意识形态》《文化的观念》,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理论之后》,抑或最近的《文学事件》等等,均是如此。

截至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伊格尔顿文艺理论思想的专著有马海良(2004)^①、柴焰(2004)^②、王天保(2007)^③、方珏(2008)^④、段吉方

① 马海良:《文化政治美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柴焰:《伊格尔顿文艺思想研究》,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 王天保:《审美意识形态的辩证法:伊格尔顿美学思想》,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④ 方珏:《伊格尔顿意识形态理论探要》,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2010)^①、丛豪亮(2010)^②、肖琼(2013)^③、林骊珠(2015)^④、王玉峰(2017)^⑤等学者的9部。它们基本上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的补充与完善,或集中于伊格尔顿早期的文艺思想,或聚焦于伊格尔顿文艺思想的某一专题。本书为研究伊格尔顿文论思想的专题论著,意在致力于和当时的伊格尔顿研究进行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并积极介入中国当代文论的论争与建设之中。本书主要包括五个部分:

其一,文学主张,讨论伊格尔顿的反本质主义文学观、文学事件观;

其二,批评观念,探讨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革命批评及其与布鲁姆的论争;

其三,文化研究,论述伊格尔顿对“文化主义”的批判与其身体观;

其四,悲剧理论,研究伊格尔顿的悲剧观念及其悲剧的政治;

其五,政治之爱,剖析伊格尔顿实践的幸福与政治之爱的主张、辨析其视野中的福柯权力观。

① 段吉方:《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丛豪亮:《伊格尔顿早期意识形态文学理论形成与内涵研究》,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 肖琼:《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

④ 林骊珠:《亚里士多德、上帝与马克思的邂逅: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政治批评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⑤ 王玉峰:《诗学和意识形态视域内伊格尔顿文化批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重写》,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第一章
文学主张

一、半途而废的“反本质主义”

文学理论界围绕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讨论至今依然如火如荼，一个重要的理论先锋人物特雷·伊格尔顿于论争中被频频提及。当然，他招来的是前者不尽的怨恨与后者持久的敬意。一个有意思的、矛盾的现象是：有的理论家既跟随反本质的大潮宣称根本没有超越历史的文学观，又对反本质主义文学观的代表人物大加挞伐。譬如，吴炫先生的《论文学的“中国式现代理解”》及《伊格尔顿批判》两文就对伊格尔顿进行炮轰。^①不过，吴先生的不少阅读是割裂式的，这使得他看起来理据十足的指责及判断实际上缺乏说服力。^②

^① 参看吴先生的如下论文：《论文学的“中国式现代理解”》，《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伊格尔顿批判——兼谈否定主义的文学观》，《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文中凡引用上述论文均不另注。

^② 此处重在讨论观点，而不纠缠于对伊格尔顿割裂式阅读的细节之上，因此仅从《伊格尔顿批判》一文中抽取如下两例以说明。其一，吴先生认为“伊格尔顿在多种场合抓住像‘这糟糕的像虫子爬的书法’这样单独的句子是不是文学语言来做文章，这就把文学作为整体的形象世界的性质与功能忽略了”。实际上，伊格尔顿是在批评俄国形式主义所尊奉的文学语言是对语言标准的偏离时，才从小说中引出那句话作例证的，这个例子证明了形式主义的文学观一旦将考察对象从诗歌放大到小说、散文就会手足无措。其二，吴先生指出：“如果未来的现实生活真的如伊格尔顿所说的大家都用霍普金斯的诗句说话，人们很有可能是会将黑格尔的著作或一张便条作为艺术对待的。很可惜的是，伊格尔顿无法论争这一天到来的必然性，理论上便可作为一种臆想来对待。”必须明白的是，这——如果大家都在普通酒馆用霍普金斯的诗句谈话的话，那么这种语言就可能不再有诗意了——是伊格尔顿按照俄国形式主义的逻辑得出的推论，他本人对此并不完全认同。因为他紧跟着就点出，如果谁想以这种语言的某些特殊用法来定义文学的话就必须直面如下事实：曼彻斯特人使用的隐喻比马威尔作品中的隐喻还多，任何一种文学手段其实都在日常话语中被广泛运用。换言之，这种定义文学的方式存在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将形式主义者的观点错安在伊格尔顿的头上进行批判，这明显是无的放矢了。

(一) 新神话：永恒的“文学性”

吴先生明确指出：“从来不存在‘超历史’的文学观，也从来不存在横穿古今的‘文学边界’。”这隐隐约约地向人们宣示，他似乎是反对文学有永恒本质的。然而，在吴先生看来，伊格尔顿的反本质主义甚是无谓，因为所有的文学都是历史的，文论史上从来就没有人宣称有过伊格尔顿所反对的文学本质，所以伊格尔顿的反本质主义究竟想说什么在他看来模糊不清。吴先生还区分了“文学观的不稳定”与“文学性的相对稳定”。换言之，他认为文学观可以不断变化，而文学性则不同：它是亘古不变的，即使当文学不存在了，我们仍然可以在大街上的某个地方一眼认出文学性来。文学也许有一天会撒手人寰，但文学性将永垂不朽。

具体探讨上述观点之前，有必要先指出这种判断建立的根据：吴先生认为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可以跨越文化、民族和时代，激起古今中外读者的共鸣和欣赏。就这个根据本身来说，它完全可以讲得通，因为我们今天确实能够欣赏先秦时代的《诗经》。问题是，当今人品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时，会否将其还解作“后妃之德”呢？《诗经》能引起人们的共鸣，不等于说今人与汉人产生了共鸣——今天和汉代以同样的方式解读，不等于他们对文学有同样的看法，他们没有从汉代传至今日的“文学性”这种东西能拿来分享。如此看来，这个论据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文学观的不稳定”与“文学性的相对稳定”的区分合理吗？需要追问的是，“文学观”与“文学性”两者究竟有什么差别。就它们都可作为依据来断定何为文学这一点来看，没有什么差异。如果有什么“文学性”的话，当文学观变更时文学性也一定会如影随形而无法闭门不出。有意思的是，自从文学性不知哪天降临斯世后，它竟然就成了永恒之物，竟然都可以义无反顾地抛下文学而独自远行。这样的“文学性”与上帝、绝对理念又有何异？这不正是伊格尔顿奚落的那种试图想从文学中提取出永恒的内在特征的做法吗？^①我们玩多种多样的游戏：牌类、球类、棋类等等，能从它们中提炼出唯一的区别性特征吗？追求这样的“游戏性”显然也是缘木求鱼。这样看

^①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来，吴先生所做的两种区分无法立足，还变得前后自相矛盾——先是义正词严地谴责本质主义的做法，后又悄悄地竖起了本质主义的大旗。其实，本质主义的文学观并非如吴先生说的那样不存在，永恒的“文学性”即是眼前明显的实例。

在吴先生的否定主义文学观体系内，“文学性”是一个评价文学经典的极为重要的标准。永恒的“文学性”意味着永恒的文学经典，这是逻辑之必然推论，而吴先生也正是这样认为的。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吴先生所区分的强的文学性与弱的文学性就应该保持不变。换言之，经典一经确立就再也无法撼动。活泼的文学史已经最有力地对此进行了反驳。从理论的角度说，不言而喻的是，当高踞的文学本质被赶下神坛、当不变的意义被无情丢弃之后，文学经典的地位必然会被强烈地摇撼。所谓的文学经典及伟大传统，不过是“一个由特定人群出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刻形成的一种建构（construct）。根本就没有本身（in itself）即有价值的文学作品或传统，一个可以无视任何人曾经或将要对它说过的一切的文学作品或传统”^①。伊格尔顿的洞见卓识迫使人们思考如下的问题：谁的经典？什么时候的经典？因为什么被奉为经典？如果说这样的追问在其时（1982）还会有不少人对之不屑一顾的话，那么，25年后伊格尔顿为其旧作新版所写的后记就可以踌躇满志地宣称上述思考如今已被广泛地认可了。吴先生似乎对于这些共识不感兴趣，依然执着于精心设计能够评判古今中外优秀作品的理论紧身衣：判断好文学、文学经典的标准为“形象世界的创造性程度”达到“独象”——对文学性较高的价值判断——的层次。

但问题在于，是否所有的文类都会心甘情愿加盟形象创造的队伍？能否用一把优秀的尺子来度量不同文类的作品？在“形象”这一标准下，顾城的《一代人》算不上优秀之作，因为它“缺乏一种‘穿越黑暗现实’的‘文学性意识’”；而《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却能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平起平坐，因为他穿越了“侠士杀人”的老套；诗人苏轼倍受推崇，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优秀作家之翘楚，好到甚至于“让所有的文学批评感到尴尬”，因为他的诗歌能够“穿越现实”。^②实际上，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不正是努力穿

^①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② 参见吴炫：《什么是真正的好作品？》，《文艺争鸣》2007年第5期。

越漫漫长夜吗？姑且同意韦小宝穿越了侠客杀人的窠臼，但这并不能作为《鹿鼎记》与《红楼梦》同样优秀的力证。韦小宝还穿越了贾宝玉的妻妾总数并乐在其中，而宝玉生活于大观园中众多爱他的美女之间竟感觉异常痛苦、最后绝望出家，其中的复杂性恐非《鹿鼎记》能及。正如有的理论家所指出的：“揭示人物的深度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两个作家之间的距离，也是经典小说跟通俗作品之间的差距。发现人内心的复杂性，发现人的复杂的感情，甚至矛盾的感情，这是经典小说的拿手好戏。”^①谈及苏轼，不管现在将其诗歌抬到多么高的地位，不应忘记的是宋人严羽的激烈批评：“盛唐诗人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②也就是说，在严羽眼里，苏轼的《琴诗》《题西林壁》实在不是什么优秀作品，因为它们过于掉书袋、过于注重说理、过于显摆自己的才气，结果导致太着实而缺乏“兴致”、诗意直白而缺乏余韵。当然，严羽是以盛唐诗的标准来衡量宋诗，宋诗的说理难免遭到贬抑；而今天苏轼的说理诗又被人们誉为经典之作，这不是恰好证明了经典的流动性吗？不是恰好证明了“文学性”并非永恒的吗？唐诗与宋诗都成了诗歌之经典，但它们成为经典的原因是不可通约的，而且，传统经典与现代经典之间也没有什么“可通约性关系”。因此，如果反过来将宋诗誉为最高典范的话，那将置唐诗于何处呢？譬如，拿“穿越现实”的标准来衡量李白的《静夜思》的话，就不免会出现尴尬。再说了，一定要在唐诗与宋诗之间决一雌雄也没什么必要，这就如同桃花与梨花在谁最美丽上争个你死我活一样。

（二）超越“意识形态”如何可能

意识形态似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意识形态让不少崇尚“纯文学”、立志建构希腊小庙的作家和理论家鄙夷不屑，他们总以为意识形态肮脏不

① 南帆：《文学老了，我们还需要她的慰藉吗》，《学习博览》2009年第6期。

②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24页。

堪，而文学却是那么纯洁无瑕、出淤泥而不染。对这些人而言，伊格尔顿的下述断言不啻兜头一盆冷水：衡量什么是文学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①而吴先生则梦想着文学能够模糊日常意识形态而构筑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这实在不是因为文学自身有这样的特点，而且我们面对意识形态问题时有这样‘特殊的要求’。正如我们需要婚姻繁殖和培养后代，也需要爱情一样——美丽和性感是被什么社会意识形态所支配呢？而‘蒙娜丽莎的微笑’迄今依然楚楚动人，那又是被什么意识形态所制约呢？”的确，当人们长久地浸淫于意识形态后，渐渐地可能会失去辨认个中委曲的能力。尽管我们不能说所有自然的东西都具有意识形态性，但如果细细思量的话，即使连微笑、美丽等这些习见的词汇背后都会藏有意识形态性的东西：蒙娜丽莎的微笑至今依然楚楚动人，乃至于和我们并无大别。问题是：蒙娜丽莎为何笑不漏齿、而非开怀大笑？这里就会涉及宗教与笑的复杂历史关系。从楚王好细腰、环肥燕瘦到“文革”时的“不爱红妆爱武装”直至今日的瘦身、美容热潮，它们都与美丽有关，然而美丽标准的界定难道不是充满了意识形态性吗？事实上，意识形态早已潜滋暗长地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根据伊格尔顿甚为赞赏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看法，“在我们习惯性行为的‘自发性’本身，我们再生产了某些深深默许的规范与价值”；在整个文化领域内充满着符号暴力，它的使命是使权力合法化、自然化，同时将那些不合乎标准的人们烙上耻辱的印记并驱入沉默的阴暗角落。^②

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固然没错，这对那些幻想远离意识形态的批评家还有持续的鞭策之效；但这种说法的粗疏也显而易见，因此，必须进一步考究的是文学与意识形态到底有怎样的关系。伊格尔顿坦陈这个问题让人挠头皮。在他看来，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难解的复杂故事，“反映论”与“超越论”皆为简单之极端。前者是“庸俗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代表，热衷于将文学当作对占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反映；问题是这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大量的文学作品实际上都向当时的意识形态臆说提出了挑战”。^③而后者就

① [英]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② [英]特瑞·伊格尔顿：《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及其兴衰》，齐泽克等著《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0—212页。

③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页。

紧紧抓住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对抗性来定义文学，认为真正的文学常常超越它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伊格尔顿在努力探求比以上二说更合理的看法。他认为阿尔都塞与马舍雷的观点很有启发：意识形态在任何社会中都有一定的结构连贯性，文学作品一方面是该结构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改变了这一结构；而批评就应该根据意识形态的结构来阐明文学作品，“找出使文学作品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又与它保持距离的原则”。^①显然，在讨论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时，文学的挑战性并未逸出伊格尔顿的视野。伊格尔顿在其他著作中也不止一次谈过这一点，譬如，在谈到文化的观念时他指出：“文化可以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过它也同样是对反对它的承诺的批判”^②，这与乔纳森·卡勒那句有名的话——文学既是意识形态的手段，又是使其崩溃的工具——颇为相似。谈及审美意识形态时，他认为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力量有两种：一是硬性的强制性制度；二是软性的习惯、虔诚与爱，正是它们将制度的力量审美化，使人们不假思索地接受——在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才说它们是最根本的力量。然而，审美又是危险的，因为它又会有反抗、又会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提出异常有力的挑战。^③而吴先生认为伊格尔顿“忽略了文学在履行宗教功能的时候，可能已具有突破宗教的功能”，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是冒失的揣测。

意识形态在不断变化，但并非将过往予以格式化，然后在一张白纸上重新描画，而是会有一定的连续性或继承性。既然文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照此逻辑就很好解释文学观念的继承性——一种文学观念超越其产生之时代而对后世发挥持久之影响。毕竟，文学观念的更迭与自然科学中的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不同：地心说被抛弃了，但当表现说产生时并未使模仿说完全失效；文学观念的承继更还有教育制度及经典体系方面的原因。吴先生将这种继承性当作“循环性”：“如果说‘文学是人学’和‘文学的抒情性’在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稳定的观念，甚至可以与中国传统文论的‘缘情说’构成稳定的状态，正好是因为中国人始终存在一个挣脱不尊重人性的专制伦理的问

① [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② [英]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③ 参看[英]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7页。